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有所思

极端民族主义是法西斯产生的土壤

□ 郑寅达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但民族主义倾向也随处可见。在20世纪上半叶，民族主义在不少国家畸变成极端民族主义，为法西斯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发展

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是国内外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民族主要面临着是否“达标”的问题，因为在民族形成以前，许多群体可能还处在氏族、部落、部族发展阶段。根据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群体的民族主义只能产生在民族形成之后。然而进入近代以后，世界各地不同程度地受到民族主义的感召，于是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民族主义产生于民族形成之前。按照国际著名学者恩斯特·格尔纳的观点，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即“民族主义并非民族自我认知的觉醒，它只是在不存在民族的各处虚构出各民族”。学术界以前对“民族”的定义有一个共识，即“在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为共同文化特点基础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但随着民族和民族主义关系的逆转，各种不同纽结和特征的民族主义随之产生出来，如种族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由于各种民族主义的内容不同，会造成人群分割的不合理，甚至造成身份交叉和重叠的现象。

民族主义在发展初期，常常同反对封建专制联系在一起，因而容易获得正面的评价。同时，我国的世界现代史体系，长期以来以反帝反霸作为衡量事物的重要标准，因此常常把民族主义运动纳入民族解放运动的范畴，采取较为褒扬的态度。如在20世纪末撰写的“20世纪丛书”和相关论文集中，归纳出20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三次浪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民族主义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主义浪潮；20世纪末的民族主义浪潮。（武克全主编：《现代化扩展中的世界与中国》）作者除了对第三次浪潮（包括民族分离、民族冲突的浪潮）有所保留外，对前面两次基本上采取肯定的态度，认为其“主流基本上是殖民地附属国及其独立后形成的发展中国家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所进行的民族民主运动”。

其实，对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的双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早就作过精彩的论述。他们结合法国革命的实践，精确地划出进步民族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的分界线。在20世纪上半叶，以法西斯运动为表现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不能仅仅看作是例外，而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负面表现。另外，凡尔赛体系以建立民族国家的名义对欧洲地图进行改划，其中也充斥着不健康因素，有些因素就同法西斯运动的兴盛相关。

德意志人的民族主义

德意志人的群体意识形成得比较早，在公元800年前后即已萌现，那是以日耳曼人为种族基础、以德语为纽结的群体。然而，由于德意志君主被戴上了“神圣罗马皇帝”的桂冠，德意志人较早就有浓烈的欧洲情怀甚至世界情怀。根据当时欧洲人的理解，皇帝是“世界之主”，普天之下只能有一个皇帝，他是上帝的代理人，又是全人类的代表。控制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是欧洲霸主，有着强烈的优越感。

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来自外部的刺激。主要是法国大革命，包括拿破仑对德国的侵占。法国大革命为德意志人提供了民族团结的范例。而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入侵和掠夺，在激起德意志人反侵略斗争的同时，也推动着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迅速转化成政治民族主义，要求加强民族团结，建立民族国家，恢复德意志的独立性。于是德意志人的民族主义诉求日益高涨。

然而在德意志人中，不要建立民族国家，而要以原来的模式在欧洲乃至世界上谋求霸权的，当时还大有人在。其代表者就是长期被视为反动势力代表的奥地利。其统治者哈布斯堡王室坚持的是多民族的大帝国，从原先的奥地利帝国，演变成后来的奥匈帝国。如今的欧盟走的是民族国家联合的道路，不少人认为这条道路中包含有神圣罗马帝国和奥地利帝国的影子。因而，主观上倾向于保守的哈布斯堡王室，其主张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未来性。然而，奥地利的主张遇到了两个障碍。其一，该主张既不能令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德意志人满意，也不能令帝国境内的其他民族成员（即匈牙利人和捷克人）满意，诸种民族主义的浪潮对帝国的统治形成冲击；其二，统治结构松散的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难以经受战争的考验，其战斗力远不如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国。

普鲁士高举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大旗，一路顺利发展。先排斥了最强的邦国奥地利，获得德意志领袖的地位，随后以“小德意志方案”（即排斥匈牙利人和捷克人居住区）统一了德国。到了威廉二世时代，出现了一个令人可怕的现象，即德意志民族主义同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世界情怀”相结合，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冲击力。在一次大战以后，德国的民族主义发生了严重的畸变。

极端民族主义盛行的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西斯组织在欧洲各国和日本先后出现。除了日后走上法西斯专政道路的意、德、日三国外，出现法西斯组织的国家还包括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比利时、瑞典、法国、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葡萄牙、丹麦、匈牙利、西班牙、荷兰、芬兰、挪威和瑞士。各个法西斯组织提出的主张五花八门，但大多包含三项内容，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强调阶级合作的第三条道路外，都鼓吹极端民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以各自民族历史中某一段“辉煌”时期为资本或楷模，要求重振本民族的地位，统治和奴役其他民族。在极端民族主义方面，尤以中欧的纳粹主义为甚。

纳粹主义强调，世界历史的发展主线是种族之间的生存斗争。地球上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是有限的，而各个种族自我保存和自我繁衍的欲望却是无限的，这样就导致激烈的生存竞争。严格的必然法则是强者胜弱者灭，这就是一部血与火的世界史。

希特勒认为，各个民族（种族）之间有高下、强弱、优劣之分，这是“自然赋予”的，却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三种人类的罪恶会削弱民族的力量——国际主义、民主主义、和平主义。与它们对立的是——种族价值、个体价值、自我保护的魄力与动力。如果优等种族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血统价值，去信奉三种人类罪恶，就会因为血统的混杂而导致人种水平的下降，最终失去强者的地位。因此，各个民族客观上就是各个命运共同体，必须同舟共济，在激烈的生存斗争中求胜求强。

在这样一场斗争中，希特勒并没有接受黑格尔关于国家是“绝对观念”的最高表现和人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主宰的思想，相反，他一再强调，国家不过是保种保族的工具。如果它完成了保种保族的任务，它就是正确有用的，在它不能胜任这个任务时，它们是有害的，要么加以改革，要么弃之一旁，用更好的工具取而代之。

为了完成保种保族的重任，纳粹党声称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既不是议会民主制，也不是君主制，而是“民族的领袖国家”“日耳曼国家”“人民国家”。这种国家必须实行“领袖原则”。

那么，为什么当时极端民族主义如此盛行，并成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土壤呢？

曾经发生法西斯泛滥的德、意、日三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都曾一度落后，当它们走上争霸的舞台时，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为了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手中夺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往往狂热地宣传民族沙文主义，把全国上下的民族优越感和对外扩张意识推到顶点。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德国战败，非但发展势头遭到阻遏，而且被套上受奴役的枷锁。意大利和日本尽管跻身战胜国的行列，但是在战后安排中没有得到预期的份额。三国在国际范围内成了所谓的Have-nots（无产）国家，国内民族复仇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情绪恶性发展，要求打破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建立世界新格局。

在欧洲其他国家内，民族主义恶性发展有着不同的背景。20世纪初，随着工业经济进一步发展，世界整体化和各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各国之间的人员流动增加。很多犹太人进入经济发达地区，在新兴的金融业和传统的商业领域迅速发展，很快取得优势地位，这样就强化了欧洲各地早已根深蒂固的反犹情绪。从西欧到东欧，法西斯组织大多具有反犹的特征。此外，在欧洲经济发展过程中，东欧民族成员纷纷涌向经济发达的中、西欧国家，他们原来的生活水平并不高，能够接受较低的工资报酬，在就业方面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因而引起当地工人的不满和反对。另外，一次大战后东南欧一带的疆界变动较大，其结果，罗马尼亚由于增加了大量的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而激化了民族矛盾，克罗地亚则因遭受塞尔维亚的统治而兴起了“乌斯塔莎”运动。

法西斯政党在德国掌权后，进一步强化了民族主义的宣传和举措。结果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宣传满足了多年来痛恨凡尔赛体系的德国民众的心理需求，佐之以组建“民族共同体”的一系列举措，让德意志下层民众得到不少实惠。一时间，阶级矛盾缓和，社会秩序稳定。然而，逐步升级的反犹浪潮让不少良心人士感到不安。更严重的是，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要求让所谓的优等民族去奴役所谓的劣等民族，于是扩军、侵略、屠杀便接踵而至。在德国入侵苏联的初期，苏联个别地方的少数民族群众因为不满国内的民族政策，曾结队欢迎入侵者，但深受极端民族主义毒害的德国士兵不可能善待心目中的“劣等”斯拉夫人，于是，曾经的投敌者很快转向，加入了游击队的行列。法西斯的侵略促使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打败了法西斯强盗，并在战后将法西斯战犯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中国式慕课惠及数百所高校

——《艺术与审美》共享课程上线

本报讯（记者 曹颖新）8月31日，受教育部体卫艺司委托，北京大学与智慧树网合作建设的《艺术与审美》共享课程正式上线，美学大师叶朗领衔来自北大、清华、人大、中央美院等八所大学的校内外近20位教授联袂主讲。该课程计划在9月份向全国高校推出选课，首次开课即将有逾百所高校的大学生受益。

《艺术与审美》是此后一系列共享课程的开山之作，之后推出的共享课程将涉及科技、军事、人文、法政等通识课程，惠及中西部数百所高校，由此探索和打造“中国式慕课”的教育模式。慕课即MOOC的英译，“M”是Massive（巨大的），即一门慕课可以有无限数量的学生学习；“O”是Open（开放的），即慕课的学生以兴趣为导向，不分国籍，不分地点，只要有兴趣，通过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进入学习；第二个字母“O”是Online（在线），强调的是在线学习；“C”是Course，即课程。

这种在线课程模式2011年开始在国外兴起，是一种在线课程开发模式，近两年在中国开始流行。以往大家对网络公开课比较熟悉，即对课程进行录制，作为共享的资源放到互联网上，比如国人比较熟悉的网易公开课。而慕课模式的形式、内容、技术和分类都很宽广，发布者都是具有分享和协作精神的个人或团队，为了增强知识传播，把课程做成PPT，后期进行录音，把这类突破课堂模式的课发布到互联网上，形成大规模的网络开放课程。

传统的课堂教学是老师讲，学生听，互动也只局限于有时间地点限制的课堂上。有了慕课课堂，只要在慕课上搜索课程即可，学生可以重复观看课程难点，还可以通过论坛、在线即时通讯等工具与教师沟通，并获得在线帮助。慕课课程中，视频往往被分割成时间较短的“微课程”，这样学习的精力更集中，也符合微时代的片段化特征。学生可在课程开放周期内自由观看教学视频，提交作业，与教师互动，甚至在论坛和社区内进行互评，最后通过线上考试或提交论文等形式，教师在线上评判学生学习效果，学生由此得到该门课的学分。这种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中国式慕课”，正可以解决当前国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不足、东西部师资存在差距的问题，是一种有重大利好的教学方式变革。

据报道，对于这样一种有着巨大优势的教学方式，“更多的高校愿意去推动其产业规模化，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大、复旦大学等名校，还有一些社会机构愿意花力气去打造更专业的慕课领域。随着慕课规模的增大，国内慕课平台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形式也会越来越多样化”。

作为中国式慕课的推动者，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发挥了很大作用，该平台针对东西部高校水平差异的问题，打破校际壁垒和各自为教的局面，利用互联网的优势，为全国高校的学生提供高质量的课程资源。正如北京大学副校长高松院士所说：“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成立三年来，致力于通过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

《艺术与审美》这门课程就是中国式慕课的典范。课程依托智慧树网做教学服务，教学模式包含30学时的在线视频学习和12学时的跨校直播互动大课堂，这种混合式教学模式既有自由学习又有师生间的实时互动，更符合当今年轻学子的学习行为模式。课程将以在线学习、跨校课堂表现、期末作业各自占一定比例的形式进行考核，这种考核评价模式将更有利于学生的素质教育与能力培养。在教学过程中，智慧树网会为每个学校提供实时教学质量报告，帮助联盟、学校更好履行教育质量督导职责。《艺术与审美》是一门凝结了一批顶级学者心血、精心设计策划、线上讲授与线下讨论结合、面向全国高校大学生的艺术通识学分课程。此课程旨在提高学生的艺术教养与审美素质，引导学生追求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情趣的人生，引导学生拥有高远的精神追求。相关领域内的资深专家、学者出席本次评审会，在教育价值、社会价值等方面给予了课程高度评价。

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告诉记者，《艺术与审美》课程的建立汇聚了多方的力量。智慧树网的精细化服务团队从课程立项、策划、制作、教师团队服务等各环节都全方位参与，提供专业的适应互联网时代翻转课程的建议，并且运用其自身800所会员学校，已有近50万学生获得共享课程学分的经验和优势，架起东部、西部高校课程资源共享的桥梁。“政府积极引领，一流大学、大师深度参与，社会化企业服务支撑”的模式，将共同推动教育质量提升、实现教育公平。这就是整合创新，在美学教育领域，实现了“互联网+”的突破。

教育视野

史 镜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反腐镜鉴

□ 杨永纯

在我国古代，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反腐问题是监察制度长期关注的重要命题。我国古代针对权力监督进行了相应的制度设计，监察制度就是其中之一。从历史上看，针对腐败，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确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和社会条件之下，也有自身的局限之处。

循序渐进，制度日趋严密

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监察活动，到秦汉时期监察制度予以正式设立。春秋时虽然出现了负责监察的御史，但是真正作为一种制度予以确立，始于秦朝。御史大夫，作为中央的监察长官，位列三公，同副丞相；在地方，秦朝设立监郡御史。汉承秦制，并进一步发展了监察制度，在中央，除却御史大夫，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皆作为监察官；在地方，设立十三个刺史，用于监督地方长官，其中腐败问题就是刺史监督和汇报的重要事项；同时，汉朝出现了第一部地方监察法，随之而来的是各地言官的纷纷出现。

魏晋至隋唐时期，监察制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和完善。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统一监察机构在中央御史台脱离位于九卿的少府，直接听命于皇帝，自王太子以下，可以无人不纠正，无人不监察，其权力大为扩展；另一方面，言官制度逐渐形成，并形成了专门负责规劝的集书省，具体的职能之一就是包括对贪污腐败在内的失职、违法行为进行批驳。隋唐时期的监察制度逐步完善，出现了内外监察完善，上下层级分工，相互配合制约的局面。在中央，谏官分属中书省和门下省，共议国政，大大加强了对风纪的监督力度，在地方，唐朝设立巡查区，从十道监察区发展到十五道，再到十七道。唐朝统治者，以唐太宗为代表，尤其注重巡察使制度对官员贪污受贿问题的监督和治理。

宋元明清时期，监察制度在君权制度逐步加强的背景下，走向高度发展。其中，台谏制度逐步走向合并、中央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察、《钦定合规》作为以清朝统治者名义发布的监察法典予以颁布，都是在君权加强的背景下出现的。在打击腐败问题上，这些制度革新起到了重要作用。

客观上反腐，主观上维护君权

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客观上反腐，主观上是维护君权统治。监察权力，从其根源来看，属于权力的内部纠正，纵然言官的存在以及督察院、六朝给事中等独立部门的设立，看似给予了行政权力客观的监督和制约，但仍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制度设计，并不能给予权力运行自外而内的匡正，因此也就无法避免官官相护、勾结谋私等现象的存在。其监察目的，首先服务于君主统治和君主权威。当反腐与君主集权并行不悖时，监察制度的反腐功效得以加强。这也就是体现皇权统治和中央集权意志的御史制度被不断强化，而言官作为整顿风纪、监督腐败的有效手段，在监察制度设计层面被逐步弱化的根源之所在。

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在言官制度和御史制度上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现象。御史监察和言官谏言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两个支柱，其中御史制度强调自上而下的控制，言官制度体现为自下而上的纠正。纵观监察制度的发展历程，反映统治意志和顺应君主集中趋势的御史反腐被逐步加强，言官的反腐作用逐步弱化，直到台谏合并，明朝督察院取代谏院，彻底终结了言官制度。

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人治的产物，其反腐功效依赖于“明君政治”。监察制度发展进程中，中央和地方虽然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成文规范，但是其纠察区域、对象、事项，依然有赖于统治者的政策。机构和人员的设立、职能与权限与统治者密切相关，甚至成为最具灵活性的统治手段之一。不同的君主，会有不同的监察制度，也会有不同的反腐效果。贞观之治中的言官美名，与明朝厂卫的恶名的反差就是重要例证。因此，服务于统治者意志的古代监察制度，是一把反腐的双刃剑，往往遏制了监察权力以外的腐败风气，却无法监督权力自身的腐败。

回归法治，发挥监察实效

囿于时空的局限，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反腐工作并不总是无懈可击的，但汲取古代政治制度有益的经验教训，对于今日的反腐工作，仍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法治是杜绝腐败的关键。以法治代替人治，是坚强权力监察，杜绝权力腐败的根本。以健全法律规范为前提，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推进全社会守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落实监察制度、杜绝腐败现象的前提。

其次，制度是打击腐败的保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打击权力腐败的重中之重。反腐工作的依法进行，最终需要制度的保障。既要加强权力内部各级制度建设，也要加强权力外部监督的完善。权力的内部监督注重自我纠正，行之有效，保障效率。权力的外部监督注重批评改正，规则明确，客观公正。同时权力监察还侧重不同机构、不同人员之间的分工明确，相互监督制约，相互沟通合作，杜绝权责不明、相互掣肘，对全面落实制度性反腐具有重要作用。

最后，观念是防治腐败的灵魂。腐败问题虽然由来已久，打击腐败也绝非一日之功，但是依然需要加强权力监察，需要社会各方协同合作，树立法治观念，提高打击腐败，同腐败现象做斗争的意识。我国古代言官，纵然身处人微言轻之品级，但终有“讽议左右，以匡君失”之观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留下魏征、狄仁杰、包拯等人名垂青史，也不乏杨爵、杨涟、沈炼等忠烈之士，不畏强权险阻。也只有提升全民的反腐意识，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加强外部监督，让腐败之风无处可遁，得以遏制。

中华“和”文化一印一书法系列作品



家和雪自香

作者：李铁



作者：阿朗一笔